

# 清代台湾科举士人的移民模式 ——以张士箱家族为考察中心

周雪香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张士箱父子为了寻求科举进身之阶而东渡台湾,他们并非“窃取一衿,辄褰裳以归”,而是积极参加台湾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公益等活动,并投身于云林平原和新庄平原的拓垦,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向台湾转移,族人因赴台经营而定居下来者逐渐增多,反映在墓葬方面,经历了从归葬故乡到落葬台湾的转变过程。但直到日本占据台湾之前,拾骸归葬一直在持续,海峡两岸的张氏族人往来频繁。张士箱家族因赴台应试而逐渐定居的过程,对于研究清代台湾科举士人的移民模式及其对台湾开发的影响,应具有类型学意义。

[关键词]清代;台湾;科举士人;移民模式

DOI:10.13469/j.cnki.zgshjjsyj.2015.03.006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5)03-0052-08

众所周知,清代是闽粤居民向台湾移民的高峰期。学界对于闽粤向台湾移民的历史,大多关注于移民的原因、时间、人数及分布诸方面的研究,而对于移民模式却较少涉及。近年来,有学者利用家族文书,对清代福建沿海地区向台湾移民的两个不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以经商为主要目的的族人,与那些主要是以农业垦殖为目的的族人的移民台湾,在过程上存在相当的差异。<sup>①</sup>清代迁台移民中,除了从事农业、工商业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士人,他们大多是为寻求科举进身之阶而到台湾。这些科举移民,往往被抨击为“窃取一衿,辄褰裳以归”,“名为台之士,实则台地无其人”。<sup>②</sup>事实上,虽然有些士人在台湾考取功名后即返回原籍,但也有不少人中式后仍然留居台湾。这些科举士人的移民过程有何特点?本文拟利用已发现的张士箱家族的族谱和契约等民间文书进行考察。

## 一、张士箱家族的举业

清朝统一台湾后,设台湾府和台湾、凤山、

诸罗三县,在台湾推行与内地相同的科举考试制度,设置了府学及三所县学,开科取士。根据康熙二十五年(1686)题准的定额,台湾府学“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廪膳二十名,增广如之。岁贡以廪生食饩浅深为先后,一年贡一人”;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学,“岁进文、武童各十二名,科进文童十二名、廪膳十名,增广如之;岁贡二年贡一人”。<sup>③</sup>由于台湾文教初开,第二年礼部允准福建陆路提督张云翼之题请,为台湾生员参加乡试设立保障名额,规定台湾一府三县生员于闽省乡试中另编字号,中额一名。<sup>④</sup>雍正元年(1723)彰化设县,议准彰化县学“岁进文、武童各八名,科进文童八名”;十三年(1735)题准“设廪、增各十名,俟十年后出贡;嗣后四年贡一人”。<sup>⑤</sup>同年,经福建巡抚卢焯奏准,乡试中,台湾举人的保障名额又增加一名,共计二名。<sup>⑥</sup>按照定例,台湾府额定举人二名,乡试应录送科举人数二百名。乾隆八年(1743),巡台御史熊学鹏奏请增加台湾府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JA10005S);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MZ072)。

[收稿日期]2013-10-10

录送科举的人数 经礼部议复,允准台湾录送科举,可在定额二百名外,“择其文理清通者,酌量宽余录送;而内地不可援以为例”。<sup>⑦</sup>

由于“台地新辟,读书者少”<sup>⑧</sup>,乡试中又设定保障名额,故台地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取中较内地容易,正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由泉州知府升任台厦道的高拱乾所云:台湾“读书之子,特设台额,获登贤书,较内地之人多额少者,其难易不同”。<sup>⑨</sup>于是,许多内地屡困科闱的士人纷纷东渡台湾应考。康熙五十六年(1717)成书的《诸罗县志》记载“此邦视学之途为迂而无用。内郡之不得志于有司者,群问渡而东焉。科、岁两试,此邦之人拱手而让之;一登解额,即飞扬而归故里。”<sup>⑩</sup>乾隆初年,分巡台湾道尹士俚在其所著《台湾志略》中云“台地旧日郡邑之中颇知读书,乡僻鲜能力学,其作为文章,又多因陋就简,无甚色泽,故每逢应试,他郡之人得以冒籍侥幸。”<sup>⑪</sup>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史李宜青在巡视台湾之后的奏报中也指出“台湾四县应试,多福、兴、泉、漳四府之人,稍通文墨,不得志本籍,则指同姓在台居住者认为弟侄,公然赴考;教官不及问,廪保互结不暇详,至窃取一衿,辄褰裳以归。”<sup>⑫</sup>张士箱就是因“不得志于有司”而赴台应试士人中的一员。

张士箱,出身于泉州府晋江县鉴湖张氏望族。据《鉴湖张氏宗谱》记载,该族开基祖张延鲁,“越州人,贾武荣(今福建南安),因迎王潮入泉有功,宠锡冠带,恩受司农卿,乾宁三年(896)请命于晋江南岸屯垦,遂于湖澄而家焉”。<sup>⑬</sup>自张延鲁传到张士箱是第二十四世。张士箱高祖二十世张九韶“攻苦力学,博极群书”,曾经“十入棘围,两经备选”,可惜都未能中举,后以贡生出任漳浦学训导、湖广宜城知县、广东茂名知县、潞州府审理正等职。<sup>⑭</sup>曾祖张之埜自湖中开基魁岱(今晋江陈埭镇湖中村苏埭),购置产业,修桥铺路。祖父张奇烜,以伯仲二兄俱歿于清初兵乱,独立抚养诸侄长大成人。父亲张若昂十四岁进惠安县学,虽“耽心经史,竟终不遇”,康熙二十六年(1687)为岁贡生。<sup>⑮</sup>由此可见,张士箱家族是以耕读传家。

张士箱,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四十一

年(1702)参与编修族谱,同年入永春县学,因“冒籍”被发现而除名。次年,在台湾考取补凤山籍的台湾府学生员,四十八年补增生,五十二年补廪生,雍正十年(1732)为岁贡生,乾隆元年(1736)被举荐为“贤良方正”,次年出任漳州训导。<sup>⑯</sup>张士箱年三十而东渡、进学、食饩、出仕,他的子孙也在台湾从事举业。张士箱有4个儿子:长子张方高,康熙五十七年(1718)进诸罗县学,后由廪生捐贡,乾隆三年后相继出任建宁训导、浦城训导、永福(今永泰)教谕、福州府教谕等职;次子张方升,康熙六十一年(1722)进台湾县学,拨入府学,雍正七年(1729)拔选贡生;三子张方远,谱载“由例贡生即用县佐尹(即县丞)”,科举及出仕的具体情况不详;四子张方大,乾隆元年入台湾县学,十三年(1748)捐纳出贡。<sup>⑰</sup>

到第二十六、二十七世,即张士箱的孙子和曾孙辈,张家科举事业达到鼎盛。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三十五年的十年内,方高次子源仁、长子源德、源德长子植发、次子植华、方大长子源俊和方高三子源义等6人先后乡试中举。除此之外,张士箱的孙子辈中入泮的还有:源勋(乾隆五十年恩科贡生)、源信、源澄、源忠和源志(例贡)等5人;张士箱的曾孙辈中入泮的尚有:植材、植槐、植因(例贡)、植梅(嘉庆十年岁贡)、植树和植權(例贡)等6人。张士箱侧室洪氏孀居63年,卒于嘉庆八年(1803),“亲见嫡嗣登科入泮二十余人”。这是张氏家族科举极盛的时代。这些登科入泮者大多是经由台湾府、县学获取进身之阶,只有源信、植因与植權进晋江县学、植发入泉州府学。此后,张氏族人仍然继续努力追求功名,但入泮者渐稀,二十八世只有张鸿逵进晋江县学,二十九世只有张坤晖和张三多进晋江县学,两代没人中举,直到三十世张廷枢,光绪十一年(1885)由彰化县学武生考中武举人,另有张铭献为附生、例贡。

## 二、文化教育与社会公益等活动

台湾为张士箱及其子孙提供了获取功名的机会,他们取得功名后,积极参加台湾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公益等活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张士箱以廪生身份参与《台湾县志》编纂工作,“分管节孝,必详必慎”。<sup>⑩</sup>同年,重建台湾府学告成,“绅士谋勒石以志”,碑末详列参与其事的绅士18人,张士箱与长子张方高均在其列。<sup>⑪</sup>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以台湾丁银较内地“加倍有余”,覆准“将台湾四县丁银,悉照内地之例酌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以纾民力。从乾隆元年为始,永著为例”。“淡、澎二厅,台、凤、诸、彰四县各士民祝万年,施士安、王世恩、黄恩溥、陈国辉、张方高等各户丁金呈,各执瓣香,相率北望泥首,叩谢皇恩。”<sup>⑫</sup>由此可见,张士箱父子已跻身于台湾士绅领导层。

乾隆二年和三年,张士箱、张方高相继西渡出任教职,张方升成为张家在台湾的家长 and 代表。乾隆十四年(1749),台湾府学改建,张方升为领导人之一。巡台御史杨开鼎在《重修府学碑记》中载“台之衿士尊师重道,踊跃急公。倡议捐修者,则有侯生世辉、蔡生壮器、李生朝玺、黄生兆茂、蔡生培、张生方升、方生达圣、洪生世基等数十人。”<sup>⑬</sup>《鉴湖张氏家乘》称他“捐修台湾府文庙,督理多功”。<sup>⑭</sup>据乾隆十六年《重修府县两学碑记》载,张方升捐银一百两。<sup>⑮</sup>接着,他又领头参与迁建台湾县衙门的工作。据台湾知府方邦基呈文,迁建县署原委“迨乾隆元、二年间,县署之右建城守营,县治之前建镇标右营,操演之声逼迫不宁。宰斯邑者,非遽歿于任所,即病剧而去官。经十有余载,实授县令七人,无一秩满者。群指此署为不祥矣。……诹之绅士,议筹劝捐,即有素封之拔贡生张方升、贡生王克褒,以馆糊口之生员龚帝臣等愿为首事,广谕捐输。”<sup>⑯</sup>可见,张方升是迁建县衙的首事之一。新台湾县衙门落成后,张方升又首倡把旧衙门改修为海东书院。乾隆十七年(1752),福建布政使奖励捐建县衙门和整修书院的公文称“时有拔贡生张方升等踊跃乐输,该府陈守倡捐银百两;于是绅士开风慕义,捐助有差;俱交首事督工营建,业经竣工搬移。原有旧署,经董事召匠修葺,改为书院。”张方升捐银在八十八两至六十两之列。<sup>⑰</sup>《鉴湖张氏家乘》亦称“移建台邑衙署,木石尺寸皆所经营;海东书院倾圯,旧址狭窄,捐金倡议别建以广栽

培。”<sup>⑱</sup>

此后,张方升回家乡主持修建大宗祠,由张方大代表张家参与台湾的社会活动。从领衔倡修彰化县学可以一窥张方大在台社会活动的情形。彰化知县张世珍所撰《重修邑学碑记》载:“岁辛未(1751),绅士施士龄、张方大等始有重修之议,各输金为资;益以张达京庚午(1750)报捐之项,得白金七千有奇。……旋以他故,中辍。癸酉(1753)秋,淡分府王公鶚摄县篆,兼得岁贡生吴洛,使卒其事……复以资用告乏,仅及棧星门而止……戊寅(1758)春,世珍调任莅兹……再糜番银三千有奇……是役也……董事:岁贡生吴洛、绅士张方大、吴浚之、张达京、施士龄……”<sup>⑲</sup>《鉴湖张氏家乘》亦载“彰邑文庙倾圯,公捐金倡建,捐项不敷,独肩鼎成,建白沙书院以培人才。”<sup>⑳</sup>白沙书院据《续修台湾府志》记载“在彰化县学宫右(即县义学)。乾隆十年,淡水同知事摄彰化县曾曰瑛建。二十四年,知县张世珍重修。”<sup>㉑</sup>可见张方大等人捐修彰化县学时,白沙书院也一并重修。

张家迁台第三、四代继续参与台湾的社会活动。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彰化设立“留养局”,以收留孤老,举人张源仁捐银七十四元。<sup>㉒</sup>张源义则以生员身份参与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和《重修凤山县志》的修纂工作,担任两志的校对。乾隆五十六年(1791),重修台湾府学文庙,生员张植树和张植材各捐银十元。<sup>㉓</sup>

在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张氏族人亦有不俗的表现。林爽文之役,根据《彰化县志》卷八《人物志·军功》记载,张士箱后人有多人立军功:张植槐因“随军剿贼功,授浙江嘉兴县典史”;张源志,“随军剿贼,以杂职实缺补用”;张植嘉,赏七品顶戴。另据《台湾鉴湖张氏族谱》载,张植因和张植栢亦分别获赏六品顶戴和七品顶戴。二十八世张炳博,族谱称“曾逆倡乱,保卫地方,接引官军护送过界,丁道宪保举六品衔。”<sup>㉔</sup>文中“丁道宪”应是指丁曰健,咸丰元年(1851)任北路理番同知(驻鹿港),四年调署淡水同知,同治二年(1863)补台湾道。丁曰健《治台必告录》云“续任鹿港,又有围拏股首曾鸡角之奏。”<sup>㉕</sup>《云林县采访册》亦载“咸丰

三年 赖逆犯嘉义;五月初六日,大仑脚庄曾鸡角聚众应之,堡内大恐。”<sup>③</sup>咸丰十一年(1861)冬,戴潮春事件爆发。第二年,戴军攻陷斗六;戴党张添等攻褒忠庄。据《云林县采访册》记载,炳博儿子张景星“集乡中义勇扼要拒守,添不得逞,退攻马厝岗等处。会提督林文察率勇来援,前锋总带林国泰等自麦寮登岸,景星与各堡义首迎导官军,复斗六,擒张添于潮洋厝庄,布西寇平”。<sup>④</sup>张氏族谱称,景星“捐资助饷,曾、吴二军门保举同知衔”;景星堂弟张均洛以军功保举“五品衔骁骑尉”;景星长子张铭恩“以军功保举五品衔”。<sup>⑤</sup>“曾、吴二军门”似指时任台湾总兵曾玉明、署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

### 三、经济重心的转移

张士箱父子东渡台湾求取功名的时候,正值台湾拓垦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张氏父子亦投身于这股拓垦的洪流之中。他们在今云林平原相继开凿了大有圳、八份圳、鹿场圳等灌溉渠,在今新北市新庄平原开凿了福安陂、永安陂海山大圳、七十二分陂,为云林平原和新庄平原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家也因此成为富甲一方的“素封之家”,在台湾新垦地和故乡泉州均置下丰厚的产业。<sup>⑥</sup>随着台湾拓垦事业的发展,张家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向台湾转移,族人因赴台经营而定居下来者逐渐增多。张士箱去世后,其子孙经历几次分爨析产,每次均把泉、台两地的产业进行分割,因此,从其分家阄书中海峡两岸产业的变化可以窥知其经济重心的转移情况。

乾隆二十三年(1758),张士箱四房子孙第一次分家析产。根据阄书记载,张士箱生前曾立下遗嘱“吾没后,尔兄弟分爨,将泉、台田屋,作五股均分。高从幼追随海外,备尝甘苦,且居长,应得二股;方升得一股,方远得一股,方大得一股。”因此,本次分家遵照张士箱遗命,“将泉、台产业,除充祀田一百四十亩,并无出之庶母洪氏贍田二十五亩外,其余作五股匀配”。各房所分得产业,以长房所拈第一阄为例:

应分在泉田亩共一百一十石二斗,秧

地一所,下籽八十斤;前新厝一座三落,护厝一面,后书房、大官厅后房二间,后轩一间,北畔护厝二间,另配陈厚进引前厝,蕙舒底厝、瑗官新厝,共三所;湖中密叔厝地一所。四至登载本阄细册。应分在台田业:阄分“张陈洪”户内等庄,及承买张瑚生、张敬伯、卢高陞,并承买猫儿干社番番仔埔等庄。东南以虎尾新溪为界,北由吴厝庄头经二仑仔庄后,与八卦亭界毗连,再由大圳一直至七张犁面前圳沟为界;西南与徐长盛阿劝庄界毗连为界。另就德兴庄界内水田大租,丈明三分之一归本阄管业,内有细条登载本阄细册。另大竹园一所,内仓厝、果木、家器齐备。仍贴契价银一千大员。<sup>⑦</sup>

由于是“五股匀配”,其余各阄泉、台田业和房产大体相当。可见其时在泉州家乡和台湾的产业数量都不少,除了提留祀产和养贍田之外,每股分得的在泉州的田产租谷就有一百余石,另外还有房产等。

过了二十余年,长房张方高的次子源仁房进行分家析产,情况就有了一些变化。乾隆四十五年(1780)张源仁之妻黄氏主持其子辈的分家,所立阄书写道:

……汝父在日,置有泉、台各处产业,掌管无异。……尔父未生男时,以植柵承继为嗣,后侧室李氏生男植槐,吴氏生男植东,辜氏生女。今计各处产业,汝父在日,已将五块厝、归化庄、东势寮等庄各田园大租业,要充为通族将来义学租,经呈禀彰邑在案。余存各业,拨出泉之实业,作生员租。泉之典业,作汝父祀田。拨出泉田租、厝税,台淡水西盛庄、柏仔林庄各田园小租粟,共一千零七十九石三斗,为吾贍业,俟吾百岁后,亦归作祀田。拨出兴化庄、新厝庄、海丰庄园底租银一百七十四大员,为三男植东从师肄业及来日婚娶之费,日后永归其掌管。拨出阿劝庄、仑后庄、五块厝园底银,捷兴店生理银,共三百大员,为辜氏贍业及其女婚嫁之费。俟辜氏百岁后,归作祀田。除以上拨分外,所存租业各处等

项,因吾念植槐迩年以来,泉、台公私各事,赖其撑持,又兼家口浩大,费用实繁,宜有衰益之道。诸房亲皆以为公平,而植槐诸子亦允服心愿,是以做四股均分,植槐得二股,植柵、植东各得一股。……<sup>③</sup>

在这纸分家阄书中,在泉州家乡的产业,已大多成为家族的祀田和生员租,即使是母亲黄氏和庶母辜氏的养赡田产,在其百岁之后,也都成为房族的公产。这样,各房所得的财产,泉州家乡的物业只剩下一些房屋和宅基地,用于种植农作物而收取租谷、租银的私家田地几乎没有了。各房分得的具体产业,阄书写明“第一阄,三房植东拈得。泉业:南保众官·肯官民厝一畔;桃官民厝二间,插翼地一间,后面圪地一所;中保大书房十五架,共五间。台业:淡水西盛庄、兴直庄、海山头、三重埔、潭底庄、乌亮埔、摆接、猫儿椗庄。各处租业、店屋、租项、银项,登载细册。”第二阄,二房植槐拈得。所分泉业:南保七官民厝一间,石礮一口,厝地三间;土名引前百成官民厝一间,中保大书房、东观厅,共三间;买郎大厝一间。第三阄,二房植槐拈得,没有泉业。第四阄,长房植柵拈得。分得泉业:南保陈廷厚民厝乙座,大小十间;土名引前石礮一口;中保来旺官石礮一口;中保大书房、亭及角间,共三间。<sup>④</sup>

又如四房张方大家,由于张方大及其儿子张源俊等经营有方,产业数量比乾隆二十三年兄弟分家时有所增长。该房乾隆四十九年(1784)分家阄书云“汝父在日,习举子业,兼务经营,承祖阄分外,复有扩充。甲申(1764)之冬,汝父弃世时,惟长男源俊成人,所有家业,幸能仰体先志而守成之,随所赢余日渐加增。”<sup>⑤</sup>随着产业的“日渐加增”,在泉州的产业也有所增加。但是,在这些增加的泉州产业中,家族共有田依然占有较大的比重。其分家合约中约定“在泉实业,田一百三十三石九斗,典业四石,现在作太孺人养赡,俟太孺人百岁后,即将此田充入分岱公祀田,历年次第按股轮当直祀,收租完粮,不得推诿。祭品、祭仪公议已定,不得少替。……”<sup>⑥</sup>留存公业作为养赡之资外,源俊兄弟四人仍分得“在泉各乡典田”近四

十石。<sup>⑦</sup>但是,自乾隆五十三年起,内地积欠逐渐增多。究其原因,除了分关合约中所云“公费浩大”外,应与由于路途遥远致使泉州的产业经营管理不善有关。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因担心“债项贴利,日积日多,此业为债项所累,后日究归乌有”,方大四房子孙公议,从台地公业中拨出猫雾揀所收租谷额六百四十石八斗庄业,交长房曾孙收管,听其自己变卖,抵还内地债项。<sup>⑧</sup>

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方大第四房源清之孙炳煥、显祖兄弟分家时,在泉的产业似乎成了一种负担。该分关合约云“一在淡欠泉兑允成单银四百大员,又大成母银三百大员,又陈扑世在银一十四员零,各有字据。因管事帐目核算未明,故未得与各数分还。俟异日着落,应费出者,自应均出。又泉欠丁选来官母银三十大员,欠谨官母银八大员,因利息说未着落,候与二主言明,均当对半坐还。一泉、淡侵欠债项作二股分配,各房自应照额领还,毋得推诿贻累。”<sup>⑨</sup>从合约中不但看不到该家族在泉州产业增加的迹象,反而是欠项积累不少,往往需要用台湾的家族共有产业的收入来进行弥补。说明张氏族人的经济活动已经转移到以台湾为主了。

#### 四、归葬故乡与落葬台湾

在传统汉人社会,坟墓不仅是先人长眠之地和后人凭吊之所,更重要的是,它所寄托的风水攸关子孙后代的福祉。东汉马援“马革裹尸还”的豪言壮语,反映了汉民族归葬故里习俗的源远流长。因此,有学者指出,移民认同现居地的最重要的一个行为表现,就是死后葬在现居地。<sup>⑩</sup>根据族谱记载,张士箱迁台族人,与当时许多迁台移民一样,经历了从归葬故乡到落葬台湾的转变过程。

张士箱(1673-1741)于乾隆二年出任漳州训导,六年卒于任所,运枢回籍,后与妣林氏合葬,侧室洪氏亦葬晋江。士箱四个儿子中,长子方高(1698-1764)乾隆三年后在建宁、浦城、永福(今永泰)、福州等地担任教职,二十六年因身体原因退休回乡调养,二十九年去世,与

妣卢氏合葬惠安,后改葬南安。次子方升(1701-1768),曾参与重修台湾府学、督建新的台湾县署和整修海东书院,晚年回家乡修建大宗祠,乾隆三十四年去世,与妣陈氏、继妣方氏合葬惠安,侧室高氏葬晋江。三子方远(1712-1757),族谱仅云“由例贡生即用县佐尹”,其举业和拓垦情况不详,推测他可能留居家乡,乾隆二十二年去世后葬在惠安,后改葬南安,妣庄氏葬晋江;侧室洪氏,卒乾隆四十年(1775)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瓦棺葬晋江。死后四十多年才安葬,推测其生前可能居住在台湾,死后以瓦棺归葬故乡(其子张源忠乾隆三十七年进台湾府学)。四子方大(1715-1764),乾隆十三年捐纳出贡后,到新庄平原从事拓垦事业,二十九年去世,自台运枢回籍安葬,妣李氏、侧室施氏亦葬晋江。可见,张士箱父子及其妻室或在家乡去世、安葬,或是自大陆任所和台湾居地归葬家乡。

张士箱有16个孙子(方大四子源恂早殇不计),其中源勋(1731-1789)、源捷(1760-1827)、源果(1762-?)和源志(1752-1795)等4人墓葬无记(源勋妻李氏和源捷妻陈氏均葬晋江);源澄(1753-1820),嘉庆二十五年卒,葬台湾彰化(妣徐氏葬晋江);其余11名男丁均葬在家乡泉州境内。这11名男丁中,源德(1718-1773)乾隆二十七年中举,二十九年参加会试返乡,一个多月后父亲去世,遵照父亲遗命,在家乡编修家乘,成为晋江缙绅的领袖。<sup>⑦</sup>源仁(1724-1772),乾隆二十五年中举,三十一年分发湖北试用知县,三十七年护理施南府通判,年底卒于官署,四十六年葬于晋江。源义(1736-1771),乾隆三十五年中举,次年抱病参加会试,歿于京邸,五十四年(1789)改葬惠安。源俊(1743-1789),乾隆三十三年中举,四十九年出任松溪训导,五十一年告养归里,三年后去世,与妣陈氏合葬晋江。源礼(1738-1770),卒乾隆三十五年,道光十七年(1837)与妻秦氏以瓦棺合葬晋江,推测应是自台湾归葬(其侧室尤氏葬彰化)。源忠(1753-1776),乾隆三十七年进台湾府学,随即补廪,四年而亡,同治二年(1863)与妣吴氏合生母洪氏三瓦棺

合葬晋江,是从台湾拾骸归葬(其侧室黄氏葬彰化)。另外5人,即源懋(1730-1746)、源信(1741-1785)、源伟(1745-1773)、源价(1749-1813)和源清(1765-1785)等,应是在家乡去世(源伟妻黄氏葬彰化)。可见,在张士箱的孙子辈中,有1位男丁和3位女性安葬在台湾现居地;有2对夫妻由台湾拾骸归葬家乡;另有2位卒于湖北官署和京邸后归葬家乡;其余7位男丁均是在家乡去世、安葬。

张士箱曾孙辈即二十七世有40余个男丁,墓葬可考的有33人,分布如下:葬在台湾彰化的男丁有10位:植槐(妣陈氏葬晋江)、植栢、植梅、植竹(妣黄氏葬晋江)、植嘉与妣万氏及侧室口氏、植树与侧室侯氏(妣吴氏葬晋江)、植柏与妣庄氏、植桔与侧室口氏(妣庄氏葬晋江)、植耒与继妣林氏(妣黄氏葬晋江)、植榛与妣杨氏。葬在台湾淡水的有:植料与妣丁氏。以瓦棺归葬的男丁有6位:植梯与妣萧氏、植棣、植冕与妣郭氏、植岩与妣陈氏、植杼与妣陈氏、植莲与妣吴氏(继妣尤氏葬彰化)。葬在家乡晋江及附近南安、永春的男丁有16位:植发与妣陈氏(继妣陈氏葬彰化)、植华与妣周氏、植材(即植柵,妣吴氏以瓦棺葬晋江,应是自台湾归葬;继妣黄氏葬彰化)、植东、植商、植香、植科、植挺、植拔、植柯(妣蔡氏葬彰化)、植楠与妣黄氏、继妣郑氏及侧室陈氏、植柄与妣倪氏及侧室曾氏、植杯及植懽、近光(以上2位葬南安)与植获(葬永春)等。这16位男丁,有些是晚年告老回乡,如植发,乾隆十七年入泉州府学,三十年拔贡、中举,四十六年分发山西,历任汾西、凤台知县,五十四年丁内艰而回。植华,乾隆三十年入台湾县学,三十三年乡试中举,特授永春州学正。

二十八世以后,迁台张氏族人以落葬台湾为主,但仍有一些族人因留居而葬在家乡或死后归葬家乡。以方远房为例,炳池与继配陈氏合葬彰化,原配薛氏以瓦棺葬晋江;炳沛妻黄氏“同治二年以瓦棺原葬湖中北洋昔厝大墩……公仝祖质诚(即炳沛父植莲——引者注)合葬此墩”;炳汪葬彰化,妻蔡氏葬晋江;炳潦葬彰化,妻吴氏与子坤润葬晋江。又如方大房,鸿

達、鴻藻和紹基兄弟三人及紹基長子坤岷、次子坤報均葬晉江,紹基原配陳氏隨子坤瀛及媳丁氏由內地到淡水,在新莊去世,葬潭底公館地。至光緒四年(1878),坤岷之子維祺將祖母骨骸拾起,寄回晉江安葬。<sup>⑭</sup>鴻藻嗣子坤早之原配曾氏葬晉江,後繼配王氏以瓦棺與曾氏合葬。炳超附父母葬晉江,妻莊氏亦以瓦棺葬晉江。含笑與妻吳氏合葬晉江;其弟顯祖葬台灣淡水,妻陳氏葬晉江。含笑長子坤銓與妻李氏及顯祖長子坤梗均葬晉江。

## 五、結語

綜上所述,張士箱父子為了博取功名而跨海東渡,他們在台灣考取生員、獲得進身之階後,並沒有立即“飛揚而歸故里”,而是積極參加台灣的文化教育與社會公益等活動,諸如台灣府、縣學和書院的修建,遷建縣署,設立“留養局”,編纂府、縣志等,在平定社會動亂中亦有不俗的表現。與此同時,張氏父子亦投身於台灣拓墾運動的洪流之中。他們在今雲林平原和新莊平原大興水利,成就良田萬頃,成為富甲一方的“素封之家”,在台灣新墾地和故鄉泉州均置下豐厚的產業。隨著台灣拓墾事業的發展,張家經濟活動的重心逐漸向台灣轉移,族人因赴台經營而定居下來者逐漸增多,反映在墓葬方面,經歷了從歸葬故鄉到落葬台灣的轉變過程。但直到日本占據台灣之前,拾骸歸葬一直在持續,海峽兩岸的張氏族人往來頻繁。張士箱家族因赴台應試而逐漸定居下來,是科舉士人定居台灣的一個比較典型案例,類似的家族還有許多。因此之故,我們研究張士箱家族的移民模式,其意義不只是局限於一個家族史的研究,它對於研究清代台灣科舉士人的移民模式及其對台灣開發的影響,應具有類型學意義。

### 注釋與參考文獻:

- ①陳支平《從蔡氏家族文書看清代海峽兩岸的移民模式》,台灣《海洋文化學刊》第5期,2008年12月。
- ②《台案匯錄丙集》卷八《戶部“為本部議覆內閣抄出巡台御史李宜青奏”移會》,台灣大通書局1987年,• 58 •

- 第318頁。
- ③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卷八《學校》,台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340-342頁。
- ④高拱乾《台灣府志》卷十《藝文志》,台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234-235頁。
- ⑤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卷八《學校》,第342頁。
- ⑥《清世宗實錄選輯》,台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51頁。
- ⑦《清高宗實錄選輯》,台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32頁。
- ⑧高其倬《奏聞台灣各學寄籍諸生宜歸本籍事》,《雍正朱批奏折選輯》,台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145頁。
- ⑨高拱乾《台灣府志》卷十《藝文志》,第244頁。
- ⑩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五《學校志》,台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80頁。
- ⑪尹士儉《台灣志略》中卷《學校士習》,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42頁。
- ⑫《台案匯錄丙集》卷八《戶部“為本部議覆內閣抄出巡台御史李宜青奏”移會》,第318頁。
- ⑬宋仲祥《重修鑑湖張氏宗譜序》,張觀使編纂《鑑湖張氏宗譜》,收入陳支平主編《閩台族譜匯刊》(26),據明永樂十年稿本影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頁。
- ⑭張源德等編纂《鑑湖張氏舊譜》,收入陳支平主編《閩台族譜匯刊》(26),據乾隆三十年稿本影印,第245-246頁。
- ⑮張源德等編纂《鑑湖張氏舊譜》,第268頁。
- ⑯張源德等編纂《鑑湖張氏舊譜》,第267-269頁。
- ⑰尹章義撰《台灣鑑湖張氏族譜》,台灣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1985年,第110-116頁。本文關於張氏家族舉業和墓葬部分,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該譜,特此說明。
- ⑱張源德等編纂《鑑湖張氏舊譜》,第268頁。
- ⑲《台灣南部碑文集成》,台灣大通書局1987年,第19頁。
- ⑳《台案匯錄丙集》卷一《福建巡撫盧揭帖》,第3頁。
- ㉑《台灣南部碑文集成》,第50頁。
- ㉒張源德等編纂《鑑湖張氏舊譜》,第271頁。
- ㉓《台灣南部碑文集成》,第525頁。
- ㉔《重修台灣縣志》卷三《建置志·公署》,台灣大通書局1984年,第92-93頁。
- ㉕《重修台灣縣志》卷三《建置志·公署》,第93-94頁。
- ㉖張源德等編纂《鑑湖張氏舊譜》,第272頁。

- ②⑦《台湾中部碑文集成》,台湾大通书局 1987 年,第 2 - 4 页。
- ②⑧张源德等编纂《鉴湖张氏旧谱》,第 276 页。
- ②⑨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八《学校》,第 360 页。
- ③⑩《留养局碑记》,《彰化县志》卷二《规制志·养济》,台湾大通书局 1984 年,第 62 页。
- ③⑪《台湾南部碑文集成》,第 151 - 153 页。
- ③⑫尹章义撰《台湾鉴湖张氏族谱》,第 143 页。
- ③⑬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卷六《平台药言》,台湾大通书局 1984 年,第 417 页。
- ③⑭《云林县采访册·大坵田东堡·兵事》,台湾大通书局 1984 年,第 128 页。
- ③⑮《云林县采访册·布屿西堡·兵事》,第 202 - 203 页。
- ③⑯尹章义撰《台湾鉴湖张氏族谱》,第 143 - 144 页。
- ③⑰参见尹章义《张士箱家族移民发展史: 清初闽南土族移民台湾之一案研究》,张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员会 1983 年,第 101 - 149 页。
- ③⑱王连茂、叶恩典整理《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 - 6 页。
- ③⑲王连茂、叶恩典整理《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第 71 - 72 页。
- ④⑩王连茂、叶恩典整理《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第 72 - 74 页。
- ④⑪王连茂、叶恩典整理《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第 11 页。
- ④⑫王连茂、叶恩典整理《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第 17 页。
- ④⑬王连茂、叶恩典整理《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第 12 - 14 页。
- ④⑭王连茂、叶恩典整理《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第 98 - 99 页。
- ④⑮王连茂、叶恩典整理《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第 102 - 103 页。
- ④⑯周翔鹤《从清代台湾公共墓地——义冢看移民的认同心态》,《台湾研究集刊》1994 年第 2 期。
- ④⑰尹章义《张士箱家族移民发展史: 清初闽南土族移民台湾之一案研究》,第 54 页。
- ④⑱尹章义撰《台湾鉴湖张氏族谱》,第 175 - 176 页。